人與事

跨界寫作

嚴方正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人們稱之爲文學家，應當是靠譜的事，可是存在例外，而且還不止一個。英國人伯特蘭・羅素（一八七二至一九七〇），一九五〇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多樣且重要的作品，持續不斷的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但人們常稱羅素爲哲學家，或數學家，或邏輯學家，或社會活動家等，此外還有一個無法歸類的雅號——「世紀的先知」。另一個英國人溫斯頓・邱吉爾（一八七四至一九六五），他因寫了《不需要的戰爭》獲一九五三年諾貝爾文學獎，但一般人都視其爲政治家。因爲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期間他曾兩度任英國首相。他領導英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二戰，是一位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法國人讓—保羅・薩特（一九〇五至一九八〇）曾獲一九六四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學界尊其爲一位法國二十世紀重要的哲學家，或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或西方社會主義的積極鼓吹者，他本人一生中拒絕接受任何獎項，包括不去領諾獎。原來這幾位傑出人物都不是職業的文學人，全爲跨界寫作者。

中國人對跨界寫作一點也不陌生，「業餘」耕耘文學的人不少成了文壇巨擘。你打開中學的歷史課本，一定會見到王安石的名字。至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還不時出現在改革者的議論中。你若讀任一本中國文學史，也一定能得知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他不但散文寫得好，躋身「唐宋八大家」之列，還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他的《讀孟嘗君傳》一文，只有八十九個字，全篇疾轉疾收，字字警策，抑揚吞吐，曲盡其妙，表現出超世俗的政治眼光和奇崛峭拔的文風。他的《泊船瓜州》一詩，如今的小學生也愛誦讀：「京口瓜州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詩中那個「綠」字是反覆推敲的結果——這成了幾乎每所中學語文教師必講的故事。

近讀一篇陳旭巖醫生寫的散文《最難的永遠不是技術》（八月六日《光明日報》），講的是兩個經陳醫生救治的危重病人的故事：一個終於起死回生，另一個只能無奈撒手。兩個故事背後的無形推手都是「錢」。那個悲慘時分如此刻印在陳醫生的頭腦中：「後來，我們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車，我看見她在哭，無聲地哭……她有一個動作我至今不能忘記：抬起她時，她使勁地抓住病床的欄杆不撒手。我知道，她這是在傳遞強烈的求生願望。」散文的結尾更發人深省：「對於臨床醫生而言，最難的部分永遠不是技術。」

讀陳醫生的文字，產生兩點聯想。其一是，如果作者不是醫生，恐怕寫不出如此有力度的作品。其二是，陳醫生寫作的文體，與「報告文學」相近。記得三十年前，作家徐遲寫了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講數學家陳景潤的故事，它曾感動過億萬讀者。徐遲寫作前，不熟悉數學，也不認識陳景潤，後來他竟「愛上了」陳景潤。今年十月，「石花杯」第五屆徐遲報告文學獎頒獎，獲獎者的共識是「報告文學作家需要聽到弱者的吶喊」。在我看來，寫報告文學的作家眞不簡單，他們不但要有良知、有激情、有才華，還要有長期堅守的體格和意志，抑或再加上有可能在做一件費力而不討好的事的思想準備，其工作的意義，不亞於陳景潤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沒讀過不丟人

姜伯靜

如是我見

法國文化部長芙勒爾・佩爾蘭近日承認，自己過去兩年沒有讀過一本小說，引發網絡熱議。她十月二十六日在電視節目說她曾與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人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共進午餐，卻答不上來最喜歡莫迪亞諾哪部作品。「我承認過去兩年我沒有時間讀書……我看了許多筆記、法律文獻、新聞，但很少讀書。」

身爲文化部長的佩爾蘭兩年沒讀過書，並且，她竟然答不上來最喜歡莫迪亞諾哪部作品，很顯然她極有可能並沒有讀過莫迪亞諾的作品，這看起來很是對不起法蘭西民族的文化。但是細細琢磨，我發現芙勒爾・佩爾蘭應該算得上是個很誠實的人，至少並不虛僞，更沒有不懂裝懂。儘管兩年沒讀過書，儘管沒讀過莫迪亞諾，可勇敢的把這個事實說出來的話，我認爲並不丟人。

孔子有句話：「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承認自己的不足，承認自己不懂，承認自己不知道，這也是一種勇氣，是一種胸懷，甚至也是一種境界。承認自己不知道，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這一點，冒充內行的人，在我們身邊比比皆是。還是以莫迪亞諾打比方，在國內，莫迪亞諾沒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幾個人眞正讀過他的作品？怕是鳳毛麟角吧。但莫迪亞諾得了諾獎，馬上，讀過他作品的人就不計其數了。恐怕，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在網上搜索了內容梗概之後，出來冒充行家的。

「不讀書」，並不見得是件壞事，正如有的法國網民所言：「如果她（佩爾蘭）說自己晚上花時間讀書，許多人會罵她不好好幹活。」而隨意指責他人不讀書，也並不見得是件多麼明智和得體的事情。當初王安石推行變法時，對某些朝臣不滿，一次對群臣怒目而視說：「公輩坐不讀書耳！」意思是說，你們這些人之所以反對新法就是因爲不讀書。一位大臣反駁道：「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王安石「默然」。所以，佩爾蘭不讀書、不了解莫迪亞諾這件事，也是情有可原的。

讀書，很高尚，但不是向他人炫耀的事情。如果整日裡把讀過什麼書掛在嘴邊，並且以此炫耀甚至教訓他人，那就有辱讀書的神聖了。更何況，佩爾蘭所謂的沒讀過書只是僅限於文學作品而已，畢竟她「看了許多筆記、法律文獻、新聞」，難道法律文獻等就不是書嗎？也許，就是興趣使然罷了。如果一個人就是不喜歡莫迪亞諾，難道非要強迫他喜歡不成？沒讀過文學作品、沒讀過莫迪亞諾並不丟人，魯迅說過，「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毛澤東與斯大林

李景賢

往事鈎沉

斯大林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於格魯吉亞哥里市，原名朱加什維利。一九〇〇年開始革命生涯。曾任聯共（布）中央總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武裝部隊總司令，有大元帥銜。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享年七十四歲。

像我這樣年紀，即七八十歲的人，對斯大林與中國的關係（又集中表現在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了解得相對多一些，大體上分爲兩個階段：在斯大林逝世前，看到的是極爲正面的一面：這位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和導師，爲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過無比巨大的貢獻。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感知的更多是斯大林消極的一面：通過王明嚴重干預中國黨內事務；認爲中國黨搞的是「人造黃油式（假的）馬列主義」；在中國解放戰爭年代，懷疑毛澤東是「亞洲的鐵托」，要在中國搞「南北朝」，「劃江而治」，即讓毛澤東治長江以北地區，蔣介石治長江以南地區；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〇年初訪問蘇聯兩個多月期間，斯大林故意讓他坐冷板櫈，以致他憤憤不平，一再稱在莫斯科只幹三件事：吃飯、拉屎、睡覺。

我從事對蘇聯—俄羅斯方向工作將近四十年，有很多機會接觸我國有關的內部材料，又看到過蘇聯—俄羅斯的解密檔案，還聽到、看到重要當事人——斯大林和毛澤東歷次會談、交談的兩位主翻——師哲（中方）和費德林（蘇方），還有中蘇雙方一些知情人的口述或書面描述，下面就從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係中選出某些側面，據此進行簡略梳理。

四大關鍵節點上的決策

斯大林比毛澤東大十四歲。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起，斯大林就開始關注毛澤東其人，感到他與王明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扎根於中國革命實際之中，在遵義會議後，默認他在中國黨內、軍內，實際上處於最高的領導地位。「西安事變」爆發後第六天，斯大林在回覆中共中央的請示電中，要毛澤東對蔣介石「不可殺」，宜與他加固抗日統一戰線。一九三八年秋，斯大林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延安，宣布毛澤東爲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在美國授意下，邀毛澤東赴重慶「商談國是」，斯大林要毛澤東前往與之周旋，爭得寶貴的時間。以上四點歸納，我稱之爲斯大林在四大關鍵節點上對於中國革命的決策。

長期以來，斯大林一直視中國共產黨爲共產國際在遠東一個支部，斯毛二人，實際上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斯大林在上述四大關鍵節點的重大決策，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至關緊要。誠然，重要歷史人物的重大作爲，都首先爲了本民族（斯大林從民族屬性來說，是個格魯吉亞人，但從社會屬性來說，他自認爲是個「俄羅斯人」）、本國的利益，斯大林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關於「南北朝」、「亞洲的鐵托」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後不久，蔣介石就撕毀國共「雙十協定」，引爆了中國內戰。在斯大林設定的中國戰略棋局中，中國戰場分爲關外、關內兩大塊。據他估計，中共奪取關外的東北，尚不至於引起美國干預，但中共軍隊如入關作戰，就會招致美國軍事干預，這勢必威脅蘇聯東部的安全。於是，斯大林便決定調處國共內戰。一九四八年初，克格勃高官、蘇聯駐華使館原武官羅申，被斯大林選爲新任駐華大使，讓他向美方和國民黨政府進行游說，以便國共兩黨劃江而治，來個新「南北朝」。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其政府南退至廣州，在美等國大使拒絕「跟退」的情況下，蘇大使羅申卻受斯大林之命，令人驚訝地也撤到廣州，成了駐「閻錫山政府」的代表。由此可見，即使到這個時候，斯大林還是不放棄在中國建立「南北朝」的初衷。毛澤東感到斯大林對他不信任，這顯然是一大緣由。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當毛澤東接到斯大林要他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電報時，就懷疑其搞「南北朝」的圖謀，遂覆電稱：蔣介石邀他赴渝相談，只不過是「國民黨的和平騙局」。只是在斯大林反覆勸說下，毛澤東才勉強同意去重慶見蔣介石。斯大林懷疑毛澤東會成爲「亞洲的鐵托」，也並非空穴來風。他通過多種「內線」得悉兩個重要情報：一是毛澤東在外蒙古、蘇聯在「中國東北固有利益」兩大要害問題上，均持不利於蘇聯的立場；二是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後要同美國拉關係。

毛澤東與斯大林交談、會談的蘇方主翻費德林在回憶錄中，專門談到上述「南北朝」問題。他說，兩位領導人絕對沒有談過此事，這也許是中國人的一個猜想。

中蘇互派大使

對於新中國的成立，斯大林是高興的，這主要出於他對世界大格局和國家安全的考量。這位蘇聯領導人有一個獨特的國家安全觀，其基本內核是：在俄羅斯本土的東、西、南三部，構築起三條「安全緩衝地帶」，而北部的北冰洋，則是其大無比的天然屏障。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在西、南兩部，對斯大林來說，可謂如願以償，缺的是東部這一塊。新中國的誕生，被斯大林視作蘇聯在東方對抗美國、日本最重要的戰略屏障。毛澤東爲了使新成立的共和國能夠盡快站穩腳根，在政治、國家安全、財經等方面，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別無它路可走。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蘇互換大使便成了當務之急。還在一九四九年春，毛澤東在西柏坡，就對秘密來訪的斯大林代表米高揚說：新中國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蘇聯。斯大林也急於向新中國派出大使。前些年，我看蘇聯原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寫的回憶錄《重返天安門》時，了解到一個重要細節。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新中國誕生之前幾天，他奉斯大林之命，拜訪了已經進住北京城裡的周恩來。他轉達斯大林的話說，擬派羅申爲首任駐華大使。周恩來得知此消息後，即向住在隔壁的毛澤東匯報，過了不一會兒，就作出如下答覆：毛澤東同意斯大林這一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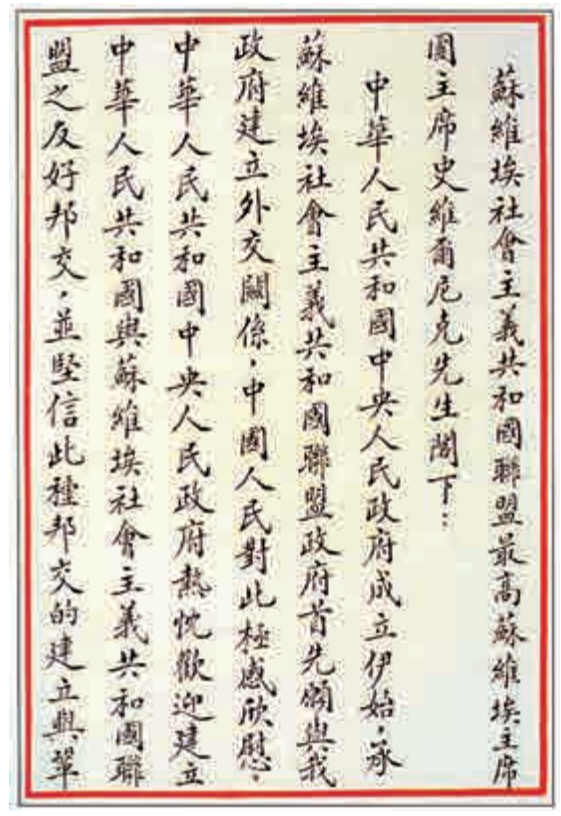
駐蘇聯大使的不二人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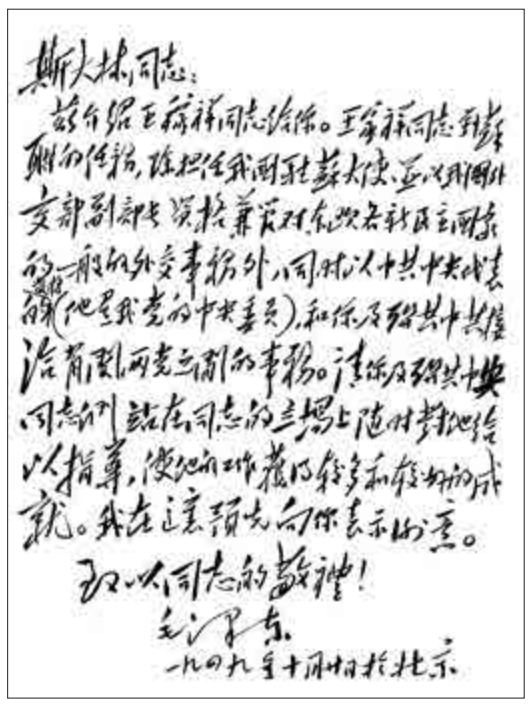
在毛澤東心目中，王稼祥是首任駐蘇聯大使的不二人選，因爲唯有此人，他和斯大林兩人都信得過。王稼祥一九〇六年八月出生於安徽涇縣，一九二八年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在一九二五年，他剛滿十九歲的時候，就受黨的派遣，先後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三十年代，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九四九年夏，陪同劉少奇秘密訪蘇。在這次訪問期間，履行公務之餘，王稼祥作爲「內定大使」，多次到國民黨政府原駐蘇聯大使館察看，準備做接收工作，而此前，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蔣廷黻以及其他館員，已棄館撤往歐洲。

應當指出，有個實情尤爲重要。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先後指派王明、博古、洛甫等三名所謂的「國際派」（即在蘇聯留過學的人）領導中共。實踐證明，這三人都成不了氣候，共產國際這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最終只好選擇了毛澤東。一九三八年秋，斯大林派人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共領導層傳達共產國際（也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其中有兩句話特別要害：「國際認爲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今後，中共中央「要在毛澤東爲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的問題。此外，斯大林還曾當面對王明厲聲斥道：「今後不要再與毛澤東爭！」對斯大林此舉，毛澤東看得很重，心存感激，認爲「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受命傳達斯大林「聖旨」的，不是別人，正是王稼祥。此番當「欽差」，是他本人一生經歷中最「顯赫」的一章。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王稼祥爲新中國首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王稼祥大使一行十三人原定於二十日下午五時乘專列前往莫斯科履新。由於新中國剛剛成立，來不及製作護照，我外交部只好爲他們集體開了一封證明信，臨時當作護照使用，請蘇聯政府給予關照：「惟因護照不及趕辦，暫發給證明書，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請電達貴國政府分飭沿途關卡查照，准予以外交護照待遇爲感。」因爲要出席毛主席宴請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的活動，王大使一行推遲至當晚十時才離開北京。

（《毛澤東與斯大林》之一）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
團主席史維爾尼克先生閣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首先倡與我
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中國人民對此極感欣慰。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熱忱歡迎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之友好邦交，並堅信此種邦交的建立與鞏


斯大林同志：
為介紹王稼祥同志給你。王稼祥同志到蘇聯的任務，除担任我國駐蘇大使，並以我國外交部副部长資格兼管我在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務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聯共中央進行關於兩党之間的事務。請你及聯共中央同志們站在同志的立場上随时對他給以指導，使他工作獲得較多和較好的成就。我在這預先向你表示謝意。
敬以同志的敬禮！
毛澤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四日於北京

（上圖）新中國致蘇聯國書

（左圖）毛澤東致斯大林的親筆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

毛澤東在斯大林七十壽辰慶祝會上

選美雜說

商子雍

文化什錦

作爲一項文化活動，選美在國外已有較長的歷史，而傳入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以後，至於較爲廣泛地被社會接受，也不過十幾年時間吧！

在世界各國，選美好像都是專爲展示女性的優美而設置，至於男性的健美，卻無須登上舞台，接受品評。之所以如此，長期以來以男性視角爲主體的文化結構，恐怕是原因之一（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女爲悅己者容」，所表現的，就正是這種男性視角）；另外，由於生理結構和倫理規範的不同，女性身體和氣質的優美，也似乎更具審美價值。當然，這樣認爲，是不是恰恰暴露了我作爲男性的審美趣味、也是一種偏見呢？不好說！

但不管怎麼講，對美的嚮往和追求，總是不能否定的；更何況，在一個多元文化共生、共存、共贏的地球村裡，任何一種文化樣態，只要不與人類所必須堅守的普世價值和道德準則相悖，就應該有它發展的一席之地；我對選美活動的認可，也正是基於此。還想強調指出的是，由於能夠說得清和暫時說不清的原因，人和人在天賦上多有不同，一個合理的社會，應該讓具有各種天賦的人，都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有科學天賦的女性，去爭當居里夫人吧；有運動天賦的女性，去爭當小威、爭當郎平吧；有政治天賦的女性，去爭當戴卓爾、爭當希拉里吧；而那些「天生麗質」的女性，則不妨走上選美舞台……

毋庸諱言，對選美或多或少持有負面評價者，眼下仍有存在。選美本來就是一種小衆文化活動，再加上活動本身的組織和宣傳可能尚有不足，這無疑會導致公衆對選手成長歷程以及賽事選拔程序了解的欠缺，使得不少局外人誤認爲選美就是選面容和形體上的美女，參賽選手不過是「繡花枕頭」、「花瓶」罷了，不值得大衆去尊重。當然，選美這麼一項活動，的確只是在面容和形體上得到公衆認可的少數年輕女性的專利，但這絕不意味着僅僅憑藉着一副好皮囊，就可以在選美舞台上所向披靡。要知道，選美舞台上美女如雲，彼此的差距並不大，勝出者主要仰仗的，其實是氣質和才藝。在陝西小姐評選和西部小姐推選的決賽現場發表評委感言時，我曾多次陳述這麼一個觀點：「漂亮的女人不一定可愛，可愛的女人一定漂亮。」鼓勵參賽選手要內外兼修，力爭做一個德藝雙馨的優秀女性。在這裡，我還想就這個問題稍稍多說幾句。

改革開放之初的一段時間裡，美國的電影藝術曾讓我讚嘆不已，通過銀幕，一些優秀的演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柯德莉・夏萍是荷里活的傳奇巨星，她在電影圈裡二十一歲出道，八十七歲退隱，九十六歲辭世，可謂影壇常青樹。近七十年的從藝生涯中，柯德莉・夏萍十二次獲得奧斯卡提名（全部是女主角），四度摘取影后桂冠，在荷里活的歷史上，少有出其右者。

有趣的是，柯德莉・夏萍並不是世俗認知中那種荷里活式的美女。曾有人公開指責柯德莉・夏萍，說她滿臉雀斑缺乏女性魅力；對「滿臉雀斑」這樣一個事實，夏萍當然無法否認，不過這是否一定會導致「女性魅力」的缺乏呢？她的回答是：「總有人對性感的理解跟您不一樣。」

但另一方面，柯德莉・夏萍的「機敏風趣，舉止高雅」，卻被交口稱讚，至於她在藝術創造和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敢、自信、自由和率直，也被認爲是美國的象徵，代表了眞實而又理想的美國女性。